

政改討論要重回基本法框架

□劉迺強

【正思香港】

上周政治上最戲劇性的發展，是李柱銘於周二主動提出由提名委員會提名五個特首候選人作普選的方案，並隨即於周四正式收回。他這一舉動於提出後就已引起了很多猜測和來自反對派的責難，但建制派一則的民建聯反應十分積極，譚耀宗和葉國謙都予以正面評價。於李柱銘宣布收回方案後，同樣引起另外的一些猜測和指責。

據云李柱銘於宣傳收回方案時，私下表示他的目的已達。這種不作談心猜測，單從表面可見的情況來說，他此舉可視為火力測試，並且似乎已經探測到建制派的反應：建制派可以接受類似的方案，或者起碼會接受以此為談判的開始。而他之所以被他的反對派同路人反對，並非認為這方案有什麼問題，只是認為他過早泄露了他們的底線。這裡先作個預測，將來反對派接受的方案，將會是這個方案的變奏，例如最終會接受三個候選人之類。反正目的只有一點，反對派一定要有一個人能出線參與特首普選。通過這次試探，大家都已經心裡有數。

事實上，從反對派的角度看，李柱銘不但目的已達，事實上建制派還吃了小虧，因為他這方案的前提是中央放棄了特首愛國愛港的要求。以接近的邏輯，戴耀廷於上周六提出，他可以接受提名委員會的「預選」，只要提名委員會的委員由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產生。

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些試探氣球畢竟都是說了就算，沒有任何約束力的。所以，戴耀廷是否會堅持提名委員會委員由普選產生這狗屁不通的要求，或者中央是不是就此放棄了特首愛國愛港這最基本的要求等，其實並不重要，反正除了中央正面授權的人之外，誰都不能代表中央。重要的是李柱銘和戴耀廷都不約而同的承認了提名委員會機制，這也意味着反對派有些人開始逐步回歸基本法的框架之內去討論政改。從這個角度看，這觀點是一種進步，值得我們肯定，並且以此作為對話的起點。

於大家都接受了提名委員會之後，我們才可以踏出另外一步：在基本法框架內討論它如何組成。比如說，由普選產生委員，能否保證其「廣泛代表性」。這樣的一步一步向前走，到最後才處理要提名多少個候選人的問題。李柱銘突然之間跳了好幾步，驟然提出他這五個候選人方案，的確是不成熟之舉。不過出自李柱銘之手，我一點都不覺得意外。

令我覺得失望的是，建制派如此善意回應，顯見真有爭取於2017年落實普選的誠意，但反對派卻對這善意予以十分敵意的冷待。這裡釋放一個很不好的訊息：反對派毫無理性探討如何落實普選的誠意，壓根兒不講道理，不想落實普選。對此，我也不覺得意外，反對派就是反對派，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幹，只是反對。別搞錯了，他們根本就不就是什麼民主派。

波士頓爆炸案對港的警示

□甘希文

【正思香港】

我要首先說一聲對不起，這篇文章有「抽水」之嫌。死者為大，我實在不應該用尚溫熱的鮮血來沾饅頭，用別人的生命來做自己的談資。只是，我相信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無價的，不分國界，所以逝者的犧牲，如果能成為地球另一邊的警號，也應能令生者節哀於萬一。

美國波士頓爆炸案，在鬧市之中造成了大量傷亡，震驚世界。其實美國被恐怖主義襲擊，已經不是偶然事件，譬如「九一一」、奧克拉荷馬爆炸案。這和美國歷年來的帝國主義干涉不無關係，這固然是應該譴責的。可是恐怖分子把無辜人民的生命做籌碼，作出既殘暴而又毫無政治作用、純粹報復和泄忿的恐怖襲擊，就更加必須堅決對付。在這方面，中國與美國立場一致，也一直有所合作。

中國也一直受到恐怖主義的威脅。新疆「七五事件」記憶猶新，以百計的兇徒在境外勢力的暗中策動下，竟可毫無先兆的、有組織的殺傷群眾，死亡人數達二百之巨，相信存在境外的準軍事人員部署、指揮、領軍、擴大事態挑起仇恨。本來，新疆的反「疆獨」敵情就比較緊張，有關部門監控嚴謹，結果還是防不勝防，可見恐怖分子行事詭秘。

隨着中國的影響力漸增，「中國威脅論」再次被炒

熱，甚囂塵上，使周邊友邦對中國不無猜疑；同時，全球權力格局也將面臨相當的調整，美國為保利益，高調「重返亞洲」，使東亞各國之間的武裝衝突風險。近日，國務院發布了標題為《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的白皮書，在官方文獻中首次正式提及了「海外利益」，說明形勢已不容掉以輕心。

香港特區在中國向來屬於「國內、境外」，人員來往自由，向來不乏各國的情報人員。在今日的正在升溫的國際風險中，香港無疑是恐怖分子或別的軍事人員的好選擇。更何況，「佔領中環」說的天花亂墜，要是一個不留神，讓人混進反政府的狂熱群眾之中挑起事端，到時候就算不像新疆「七五」那樣殺人放火，也至少是個社會危機。

早陣子，政府把添馬艦對出一段海濱劃予駐港解放軍作軍事用途。反對派不僅不視為國家保衛人民安全的措施，還大加撻伐，「本土行動」朱凱迪還聲言中共政權「窮得只剩暴力」，要威嚇香港人云云。這真是太可笑了，軍事防衛本來就一個國家的主要職能之一，何來「只剩暴力」一說？難道我們的反對派以為，只要香港擺脫了中央的「威嚇」、建立了他們口中的「民主、普選」，就將永遠被這地球上六十億人奉為掌上明珠，捨不得碰一下？他們自以為是就算了，還以市民的生命安全來做陪襯，自以為是之餘，真是殘酷不仁。

【正思香港】

兩條件決定公約的適用

□牛悅

「佔領中環」的發起人和鼓吹者，主張特首普選方案要符合國際標準，所謂國際標準就是《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所規定的，是「聯合國的標準」。公約不是哪一國家或地區單獨制定的法律，而是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一項國際條約，屬於國際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行政首長的選舉方式「要符合國際標準」，如果這種主張是強調符合公約的道德義務，那盡可以百家爭鳴；如果這種主張是強調符合公約的法律義務，這牽涉了國際法如何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適用問題，有必要講清楚。

首先，公約於1966年12月16日在聯合國大會通過，1976年3月23日正式生效。英國政府於1968年9月16日簽署了公約，並於1976年5月20日正式正式交其對公約的批准書，同時明確表示將公約的適用範圍擴展到包括香港在內的10個英國屬土。由此可見，公約的義務方必須是國際法上有權的締約主體，即主權國家。香港在回歸前作為英國屬土，不能自行決定是否參加公約。另一方面，即使英國加入了公約，承諾承擔公約義務，她對義務的履行也不必必然適用到香港，不需要明確地承諾公約會適用到香港。公約是否適用到香港，要由主權國家決定。

其次，儘管英國明確表示公約的適用範圍擴展到香港，但公約並不是作為香港的一部法律被直接執行、或是被法院直接參照引用的。這裡涉及國際法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管轄權系統內適用的問題。從國際實踐上看，國際法通常以兩種方式在國內執法或司法機關予以適用，一種是採納的方式，即國家的司法機關在個案中表示接受公約，或是立法機關在國內立法中明示國際公約的適用範圍，美國、德國和我國都是應用採納方式；另一種是轉化方式，即國際公約必須由國內立法機關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將國際公約的內容轉化為本國立法的內容，在國內予以適用，英國應用的是轉化方式。

香港回歸祖國後，自然不能再作為英國的一個屬土而隨英國履行公約義務。公約在香港適用時，需要遵守的上述兩個條件——由主權國家決定、需要通過本地立法轉化予以適用——並無改變。一方面，公約是否適用於香港要由中國政府決定。另一方面，公約也不是直接在香港適用的，仍要通過轉化為香港本地的立法予以適用，《基本法》第39條訂明：公約「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可見，如果在法律上說特首普選要符合國際標準，那也是要符合香港的本地法律的規定，而不是「聯合國標準」。

作者為香港大學法學院博士候選人

朝鮮局勢是可預測的

□畢研韜

【朝韓動向】

「朝鮮半島局勢持續緊張」、「戰爭一觸即發」，這樣的標題充斥各國媒體。「金正恩不可預測，朝鮮不可預測，後果不可預測」。這樣的邏輯分析加劇了半島緊張氣氛。我的看法正相反：朝鮮半島局勢是可預測的。原因如下：

當今國際博弈的四大武器是外交、信息、軍事和經濟（合稱DIME）。與美韓同盟相比，朝鮮在外交、軍事和經濟上都不堪一擊，為了生存，必然會拚命挖掘信息戰潛能。盲人的聽力特別好，求生本能使然。所以，現階段朝鮮的舉動，包括試射中程導彈，外界也應主要從信息戰、軟戰爭角度解讀。此其一。

朝鮮發動軟戰爭，是賭明天會更好；若發動硬戰爭，便沒有明天。朝鮮沒有實力也沒有膽量發動硬戰爭。「80後」金正恩，雖說比其父更不遵守國際規則，更不按常理出牌，但不至於失去理智。有人說，朝鮮領導自欺欺人、自我膨脹，或許真的相信自己軍力強大。筆者不信，因為朝鮮也有情報機構。此其二。

朝鮮如此挑釁，是為了利益。利益何在？生存——政權生存，國家生存。前者是內政，後者是外交。朝鮮的好戰言論完全是服務於內政外交：對內，凝聚人心、鞏固權力；對外，增加籌碼，攫取利益。外交服務於內政，歸根結底是為了延續政權。所以，朝鮮有其底線。越了紅線，金正恩政權很可能不復存在，甚至朝鮮這個國家也可能不復存在。此其三。

美、中、朝、韓、俄、北約，都不願看到朝鮮半島局勢失控，唯一不確定的是日本（但無關大局）。雖然多輪「六方會談」都無果而終，但面對戰爭這個即刻而重大的威脅，鄰國之間的立場基本一致（日本除外）。國際社會已經注意到，中國已開始調整立場。眼下的半島局勢實質上是心理消耗戰。此其四。

此間美韓連番軍演，試圖威嚇朝鮮，效果卻不彰，甚至適得其反。同理，「冷戰」以來，美國一直遏制中國，中國的國力卻持續提升，突破美國遏制的決心更加堅定。即便美國使用「巧實力」，也未建奇功。持續惡化的朝鮮半島局勢或許能讓各國醒悟，唯有加強合作，才能緩和半島局勢。此其五。

由上觀之，我說朝鮮半島局勢是可預測的，屬於戰略研判，而美國防長查克·哈格爾所說的「不可預測」，同樣是指戰略層面。結論因何不同？美國防長的結論究竟是基於技術評估，還是出於策略考量？對此，國際社會很難甄別，事實上也未加甄別。筆者卻要提醒，美、韓、日及北約之間的相關情報是共享的。

今年2月份，朝鮮官方稱，半島局勢正向不可預測的階段發展。筆者認為，如說半島局勢「波譎雲詭」，實不為過，但朝方稱之為「不可預測」，卻有誇大威脅的企圖。而美國宣稱朝鮮不可預測，事實上肯定了朝鮮的軟戰爭水平，或會鼓勵朝鮮越趨越遠，而且會加劇國民民的「緊張情緒」。我擔心，贏了「冷戰」的美國，能打贏這場「涼戰」嗎？

作者為三略研究院傳播學研究所長

中美關係實現平穩過渡

□陶文釗

克里成功對中國進行了首次訪問，雙方承諾要繼續探索建立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這為中美關係確定了戰略方向，有利於兩國關係的穩定發展，並在合作的廣度深度、質量層次上實現新的突破，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注入強勁的生命力。克里訪問和此前及緊接着奧巴馬政府高層文職和軍事官員的訪問表明，兩國關係已經平穩過渡，並將獲得新的發展勢頭。



【國際視野】

美國新任國務卿克里成功對中國進行了首次訪問。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會見了他，國務委員楊潔篪、外交部長王毅與之進行了會談和交流。用他自己的話說，訪華成果超過了預期。那麼，他訪問的成果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打造中美合作新亮點

首先，奧巴馬開始第二任期兩個多月了，中國也有了新的領導人。通過克里此次訪問雙方重申了對合作夥伴關係的承諾，並表示要繼續探索建立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雙方的這種承諾為中美關係確定了戰略方向，有利於兩國關係的穩定發展。兩國都表示要保持高層戰略溝通，用好現有的各種對話合作機制。現在兩國之間有九十多個平台，它們像一條條紐帶，把兩國連接在一起。

其次，雙方都表示要不斷充實兩國關係的內容，在合作的廣度深度、質量層次上實現新的突破，打造新的合作亮點，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注入強勁的生命力。經貿關係是兩國關係互利雙贏的最有力的表現。中方特別強調了繼續發展這種關係的重要性，以此來拉緊兩國的利益紐帶。在這裡突出的兩個問題是，第一，避免將中美經貿關係政治化；第二，美國放寬對中國高科技出口的限制。對此，中國已經多次提出，美國也作過多次承諾，但「只聽樓板

響，不見人下樓」。去年美國大選，在這方面的政治考量也許多些，現在奧巴馬開始了第二任期，又正是要擴大出口，放寬對華技術出口限制，正其時也。雙方還決定發表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框架下成立氣候變化工作組。中美兩國是全球能源消耗大國，是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兩國的這一決定對於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對於創建應對氣候變化的新的國際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合推區域經濟一體化

第三，雙方強調了兩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政治互動的必要性。兩國同處這一地區，兩國利益在這裡匯合最多，但也可能在該地區出現較多分歧，奧巴馬政府在第二任期提出的再平衡戰略給這一地區增添了複雜因素，是有關國家包括中國都普遍關心的。本地區的一體化進程關係到各國利益，也是中美兩國領導人在過去幾年中多次會晤討論的話題。現在在本地區有兩個機制正處於形成之中，一個是10+6，即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RCEP），這個機制有中國而無美國；另一個是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經濟合作夥伴關係（TPP），至今有十二個國家參與談判，日本新近表示願意參加，中國不在其中。國際上有一種說法，這兩個機制是中美兩國在區域一體化問題上的競爭。其實，現在在本地區有許多經濟合作機制，這些機制可能互相重合，但不是互相排斥的。此次訪問中，中國領導人再次強調，中美應本着開發、透明、包容精神參與和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筆者認為，區域一體化不是哪個國家可以主宰的。不同的機制可以共存，可以良性競爭，目的是推動區域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發

展，而不是排斥哪個國家。在當前，朝鮮核和導彈問題成為國際社會尤其是東北亞地區國家特別關心的問題，自然也是此次克里與中方討論的一個重點。在克里訪問韓國時，他已經表示，美國不會接受朝鮮為核國家；美國願意通過和平方式解決朝核問題，包括六方會談和美朝雙邊會談；但朝鮮必須表現出核誠意。

兩國確定新戰略方向

中方強調了該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堅持維護半島和平與穩定，堅持無核化，堅持對話解決問題。六方會談曾經取得重要進展，包括2005年9月19日的《共同聲明》和此後寧邊核設施的去功能化。但由於問題本身的複雜性，近年來又出現了新的轉折。最近，朝鮮作了一系列的高調宣布，包括宣布半島處於戰爭狀態，將於近期試射中程導彈等等；而美方則加緊與盟國進行聯合軍演，大大加強了在本地區的軍事部署，把F-22隱形戰鬥機、B2隱形轟炸機、B-52戰略轟炸機等都調集到本地區，這兩種發展都是不利於地區穩定的。通過此次克里與中方的深入交流，雙方應該更加明確對方的意圖和立場，應該有利於在今後一個時期降低半島的緊張局勢，通過有關各方的共同努力，盡早恢復六方會談。筆者認為，最終實現半島無核化需要兩個進程：一個是無核化進程，一個是使孤立的朝鮮融入地區社會的進程，這兩個進程的平行推進將使本地區避免衝突和戰爭，使所有國家受益。

克里的訪問和此前及緊接着奧巴馬政府高層文職和軍事官員的訪問表明，兩國關係已經平穩過渡，並將獲得新的發展勢頭。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中國夢與美國夢之異同

□秦曉鷹



【神州點面】

習近平上任國家主席滿月，他提出的「中國夢」在一個月內也迅速升溫。夢，始於無意識地構建，也始於有意識地無形。夢，始自人們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也始自天下蒼生擺脫苦難的渴望。從這些最基本的要素的角度來看，把眼下中國公眾熱議、內地媒體熱炒的「中國夢」與至今仍有一定熱度的「美國夢」加以比較，是一件令人頗感興趣的事。

當代中國人（請注意筆者所指是「當代」人）對「美國夢」的知曉和了解既不新多也不久遠。年輕人從「大嘴」羅伯茨和理查·基爾聯袂出演的電影《Pretty Woman》中知道世界上似乎有一個地方，在那裡可以實現麻雀變鳳凰的夢想。中年人閱讀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 The Glory and the Dream》，看到了一個真實而非夢幻的美國。而對不少中國的老年人而言，他們對美國夢的十分有限地了解，恐怕要歸功於丁·路德·金的著名講演《I have a dream》帶來的觸動。順便說一句，這篇講演在中國流傳甚廣，在知識階層幾乎是家喻戶曉。

奧巴馬是「美國夢」最大代表

然而，美國夢的出現和它在世界的影響卻是一種客觀存在。事實上，自美國立國以來，憑藉着自然資源與地理環境的得天獨厚，憑藉着把平等自由等歐洲進步思想的創造性移植，憑藉着清教主義思

想與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有力結合（參見馬克斯·韋伯所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不少人在美國實現着、也實現了自己的「淘金夢」、「成功夢」。即便是到了今天的信息時代，蘋果之父史蒂夫·喬布斯、微軟的比爾·蓋茨不是仍在續寫這一夢想嗎？當然「美國夢」的代表人物還有很多，最大的代表恐怕就是現任總統奧巴馬了。

那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久前提出的「中國夢」，與前面所說的「美國夢」又有什麼區別呢？

筆者以為，習近平主席所說的「中國夢」其實就是中華民族的百年圖強之夢，就是中國人要努力擺脫近代以來種貧積弱的民族生存狀態之夢。換句話說，所謂的「中國夢」最初的萌動其實就是擺脫苦難的渴望，就是從擺脫民族噩運的心態演化而來的一種意願和理想。這種擺脫民族噩運的心態產生於170年前的鴉片戰爭，而當日本法西斯軍隊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後，這種心態就迅速成為了全民族的強烈的救亡意識。由此衍生的擺脫落後、富國強兵的整體意識也就自然成為了幾代中國公眾的共識和普遍信念。中國是一個有着數千年文明的、極為自尊的國家，它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所遭受的欺凌與屈辱早已變成了全民族巨大的內傷。既然噩夢是全民族的，那麼，擺脫噩夢的期盼和夢想自然也屬於全民族。因此，中國夢首先是集合式的整體觀念，是一種群體訴求和集體式願景。這一點與美國夢中的個人主義價值觀有着很大區別。

既然「中國夢」帶有非常明顯的群體特色和民族國家這一層面上的意義，那麼它就必然會在外交、軍事和綜合國力上有更為果敢而鮮明的舉動。如果我們把「中國夢」分解為「外交夢」「強軍夢」和「國力（持續增長）夢」，那麼，習近平在今年頻繁的外交活動中一再強調中國與世界的相互關聯

與相互依存，就具有很明顯地希望改變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傾向。而他一語雙關地警告某些人「不要因一己私利」而攪亂地區局勢和世界和平，更展示了中國對國際事務勇於擔當和日益強烈的責任意識。如果這是在實現「外交夢」，那麼，中國軍隊宣布，將在2013年進行40多次各種類型的軍事演習，就是對「軍事夢」「強軍夢」的最直接的印證和說明。

「中國夢」是追求幸福之夢

也許有人會問，中國實現這些具有民族整體意識和群體特色的「中國夢」的過程，會不會演化為一種對外部世界的威脅呢？這恐怕是許多西方媒體和人士一種不願言明的內心疑問。其實，習近平對此已做出了回答。他說，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而這條路是哪裡來的呢？是改革開放30多年走出來的、是從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深深刻結中走出來的、是從中國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因此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就像人的DNA不可改變一樣，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密碼也是不會輕易變化的，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不事擴張、不事霸權、素以安分守己為美德的國家，它的歷史軌跡更是不可改變的。

「中國夢」不是俾斯麥的鐵血之夢，不是大和族的東亞共榮之夢，也不是日不落帝國曾經有過的殖民之夢。它歸根到底還是中國公眾追求幸福之夢。在中國，任何一個政黨和任何一個政治領導人，其所追求的興國強國的施政結果最終都要由國民的幸福感受來判定。在這一點上，「中國夢」與「美國夢」又有了目標的同性和路徑上的殊途同歸。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